

改革只有进行时

对3个三中全会改革决定的回顾

高尚全 著



人民出版社

改革只有进行时

对3个三中全会改革决定的回顾

高尚全 著



人民出版社

策 划：黄书元
组 稿：张振明
责任编辑：朱云河 忽晓萌
封面设计：马淑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只有进行时：对3个三中全会改革决定的回顾 / 高尚全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01-012769-9

I. ①改… II. ①高… III. ①经济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1563号

改革只有进行时

GAIGE ZHIYOU JINXING SHI

对3个三中全会改革决定的回顾

高尚全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1.5

字数：168千字 印数：0,001—10,000册

ISBN 978-7-01-012769-9 定价：25.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序 言.....	1
引 论 三中全会是开启新一轮改革的战略起点.....	3
第一章 十二届三中全会：写出了 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17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	17
第二节 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	25
第三节 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历史意义.....	43
第二章 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社会主义市 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设计.....	53
第一节 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产生的背景.....	53
第二节 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的过程.....	56
第三节 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 重大贡献.....	63
第四节 两个重大理论问题是怎样突破的.....	75
第三章 十六届三中全会：改革正未有穷期.....	83
第一节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背景.....	83
第二节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	87
第三节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创新及意义.....	106
第四节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待解决的几个突出问题.....	110

结 语 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实现中国梦..... 119

附 录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124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1984年10月20日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144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1993年11月14日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165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2003年10月14日通过)

序 言

在今年年初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新书发布会上，人民出版社黄书元社长向我提议，希望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我参加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起草的回顾》的基础上充实内容，拓展整理成一本更具有纪念意义的书，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出版，供关心改革的人士参考。我觉得他的这个提议很好，于是花了几乎半年的时间整理故纸堆里的材料，还联系一些老朋友帮忙收集，最后每天早晨五点起床爬格子，把我参加3次三中全会改革的经历和感悟都写了出来。这对于我这样一个80多岁的老人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令人欣慰的是，现在终于有了一点成果以飨读者。

本书按章节分别记叙了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3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文件起草工作的经历解读和评价。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今天令我国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通过这一系列重要的中央文件一步步建立起来的，期间冲破了许多思想禁锢，突破了理论和现实当中的障碍，来之不易。在这些历史性文件起草过程中，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给予了高度的关心和重视，指导了文件的起草工作。文件起草的过程也是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过程，

历次文件的起草拟定后都交付社会各界进行广泛讨论，起草小组根据各方修改意见进行认真修改，几乎每一个文件都改过上百次后才定稿交付表决。每一个文件都见证了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同心协力推进改革的伟大历程。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决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无到有、从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最重要的3个文件。这3个中央关于改革的决定，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对改变我国的面貌、提升我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几乎都是相隔10年，党中央都会作出关于改革的重要决定，推动改革的深入。现在距离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有10年时间了，中央已决定在今年11月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这关系到我国未来10年乃至可能更长时间的改革和发展，备受国内外的关注。

系统地回顾过去这3个改革关键节点上的决定，再对比当前的现实状况和人民诉求，我们可以认识到，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都迫切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和完善也永无止境，决定了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习近平同志最近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这充分说明，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是有充分的准备和信心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所作出的新的历史性决定，将指引中国人民的改革实践登上新的高峰，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高尚全

2013年9月25日于北京

引 论

三中全会是开启新一轮改革的战略起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1月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从历史经验来看，三中全会都是关于改革的重大会议，每次三中全会都会确立新的改革目标，指引我国改革前进的几个重要决定几乎都是在三中全会上作出的。

我先后参加过6个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中有3个三中全会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个是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二个是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个是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3个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推动中国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3个决定的出台几乎都是相隔10年，现在距离上一个决定的出台已经有10年了，改革也面临着新的情况和任务。回顾过去3个决定文件的起草历程和深远影响，我们可以预见，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我国下一步改革开放作出重要的战略部署，并出台重要的战略性文件。

一、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共中央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是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关

于改革的决定，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当时的背景是怎样的呢？解放思想冲破了“左”的干扰，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1984年农业生产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粮食增产达到4070亿斤，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过去搞计划经济，农民没有积极性，农民的劳动跟自己的收入没有太多关系。所以农民说，插秧一行是七棵，前面六棵不知道给谁插的，最后这一棵才是给自己插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解决了这个问题。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丰收了，要有市场、要有销售渠道，同时也要求交换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所以就迫切要求城市改革。但是城市呢，还是原来的那套体制模式，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有以下几个弊病：

（一）政企不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失去了自主权和活力，结果宏观经济决策没搞好，微观经济活动又管得死，严重压抑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二）条块分割。把完整的国民经济分割为众多的部门所有制和地区所有制，造成了部门壁垒、地区封锁，限制了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影响了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使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地发挥。我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沈阳有两个厂，一个是变压器厂，旁边一个是冶炼厂。变压器厂由机械工业部管，冶炼厂由冶金部管。结果，变压器厂需要的铜由机械部从云南等地大批量运来，而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个企业不能横向联系，造成了大量的物资和时间上的浪费。部门之间缺乏联系，扯皮很多，“九龙”治水，对权力抓住不放，而对责任往往一推了之。这种权力最大化、责任最小化的弊病很突出。

（三）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主要不是商品生产、价格规律和市场在起作用，使企业缺乏竞争力和应变能力。

（四）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很严重。分配没有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干好干坏一个样，形成了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地压抑了企业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以上弊端使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活力，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在这个阶段，也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干扰。1982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批判了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观点，说这些观点是否定计划经济。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背景下，在党报上对“减少指令性计划、增加指导性计划”的看法开展了有组织的批判，强调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标志，还把商品经济、指导性计划作为“精神污染”来清除。可见，这一年思想理论界很紧张，理论上很混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近6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党在十二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经验，1984年10月20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决定》中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益、灵活经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原来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邓小平同志对这个《决定》予以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①“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现的一些新问题。”^①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什么重大突破和创新呢？过去大家知道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个决定第一次提出了“商品经济”这样一个概念，很不容易，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在这个决定起草过程中，党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先后八次和起草小组进行座谈，共同修改这个决定。在起草过程中，我提出，改革就是要为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从我们改革试点的实践经验来看，什么时候我们比较注意发展商品经济了，什么时候经济就比较繁荣。哪个地方重视商品生产了，哪个地方经济就比较有活力。这是我经过多次调查得出的结论。广东就是因为先搞了商品经济，才有了活力，老百姓的日子就比较过好。所以，可以这样总结，在“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句话之外，还要加上一句“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但是，我的意见提出来以后，起草小组就有人不赞成把商品经济写入决定。主要担心什么呢？害怕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混同起来，怕变成资本主义。我认为，这种担心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呢？第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的，和资本主义是有区别的；第二，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并不是对立的，商品经济越发达，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在宏观上加以指导。但是，当时在起草小组通不过。因为反对的人官都比我大，所以我没有办法了。后来我建议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于1984年9月初在北京西苑饭店开了个理论研讨会，请了20位学者专家参加会议。在会上，我首先提出：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性突破。大家一讨论，思想都比较解放，意见很一致，认为“商品经济是个必然的途径。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必然联系，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商品经济同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另外，我们也讨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十二大提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8页。

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问题。为什么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呢？因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是必须要坚持的，市场调节只能作为辅助作用。一个是社会制度，一个是手段和方法，这两个概念是不对称的。要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要么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要么计划与市场。我们把讨论的结果给中央写了报告，国务院领导同志阅后批示给起草小组，并说“马洪同志也有这个意见”。中央经过反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最终在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到决定上去。

关于计划与市场，已在世界范围内争论了近 100 年。我国理论界的争论也没有停止过。但什么是市场？我曾经在中央党校等多种场合讲过，哪里有商品交换，哪里就出现了市场，它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国自古就有了，古文中有“日中为市”的提法。一个地方有了市场，就会繁荣起来。城堡+市场，就出现了“城市”。资本主义国家叫“城市”，社会主义国家也叫“城市”，并不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就叫“城计”，也即“城市+计划”。由此可见，计划与市场这两个概念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不是社会制度的特征与属性。

二、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第二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 1993 年 11 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根据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明确了，怎么建立？当时心中没数。所以，中央专门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研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讨论研究，认为必须建立“五根柱子”。

第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第二，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第三，要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

第四，要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第五，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在起草这个决定过程中我负责市场体系这部分，当时一起参加的有郑新立、张卓元同志，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小组。在这个决定中，第一次把资本市场写上去了。这不容易，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不能提“资本”两个字，怕“资本”和“资本主义”相联系了，所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只能叫“资金”，“资金利用”、“资金周转”，不能提资本。其实，资本是生产要素，不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我们社会主义同样要利用资本这个要素。

关于提“劳动就业市场”还是提“劳动力市场”有不同意见。我坚持要理直气壮地提出劳动力市场，但有人说：劳动力怎么进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就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所以不赞成劳动力市场的提法。为了使我的建议得到高层的支持，我曾分别征求薄一波同志和李岚清同志的意见，他们的反应很积极，都作了指示。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草稿。我有幸列席参加了常委会，当时心血来潮发了言，我说：必须明确提出“劳动力市场”。我一口气讲了五条理由：

第一，劳动力的价值只能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劳动力进入市场是劳动的能力进入市场，而不是劳动者本身进入市场，不是把劳动者去作交换。劳动的能力有大小，贡献有大小。因此，反映它的价值也是有大小的。

第二，确立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就必须使劳动力要素进入市场。如果劳动力这个最活跃的要素不能进入市场，那么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就很难建立起来。

第三，我们现在就业压力那么大，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解决不了。

第四，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了劳动力市场。

第五，我们提出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我记得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说过：你们的汽车司机服务态度不够好。因为司机认为我是工人阶级，我是主人，你坐车的是仆人。主人怎么给仆人服务呢？所以心态不平衡。我认为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概念，而具体到每个

工人是局部的概念，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会议没有继续讨论，江泽民总书记只说了一句：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第二天我找了主持起草小组的温家宝同志，我有点内疚，我说：昨天我不应该发言，但莫名其妙我发了一个言，当时有一个冲动，因为如果我不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就出不来，“劳动就业市场”就动不了。家宝同志很敏锐，他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没有把握。家宝同志为了把“劳动力市场”写到《决定》上去做了很大努力。后来他把我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材料报送给江泽民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又批转给各中央常委，各常委表示没有意见。所以后来把劳动力市场写进了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三、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第三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就是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当时是什么背景呢？从发展成果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以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逐渐形成并日益发挥出市场机制的巨大效益。对外开放则因为加入世贸组织而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许多在内部难以突破的体制机制障碍因为对外开放的倒逼机制而被迅速克服，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2003年我国的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正因为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当时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搞得差不多了。但实际上，改革任务仍然十分繁重，正是由于整个经济体制正大踏步地迈向市场化，旧体制与新的经济力量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新兴市场主体的壮大对市场体系、金融体制、投资门槛、国企垄断，以及政府职能等一系列体制性障碍提出了新的改革诉求，市场化的经济基础对整个国家的体制机制形成了更进一步、更广泛的改革压力。中央及时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有以下几个创新点：

第一，提出了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第二，提出要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第三，提出大力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原来在重要力量后面还有“和生力军”四个字。后来我提出：“重要力量”就可以了，“生力军”可以不写了，因为有些领域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了主力军了，例如就业问题，五分之四是靠非公有制经济解决的，最后就把“生力军”删去了。

第四，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第五，最重要的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论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我曾经两次在起草小组会议上发表意见。第一次是2003年4月23日讨论文件大纲时，我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动态性的、阶段性的概念。

一是从理论上讲，改革是无止境的，完善也是无止境的。因为经济基础是不断变化的，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必须不断与此相适应。

二是从实践来看，完善也是动态的、阶段性的。完善的阶段性，就是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阶段。

第二次是在2003年6月9日的全体会议上，我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几个理论问题：

如何理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并指出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意质的提高”。现在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公有制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优势发生了变化。

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居民财富越来越多，民间资本越来越多。个人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的增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到2000年底，非公有制经济资产已经占全社会总资产的65%。个人的金融资产总和已超过国有资产。而且随着国有经济战略布局的调整，公有制经济将进一步收缩；国家实行公共财政，对国有企业的投入将逐步减少；对外开放的扩大，引进外资将进一步发展。因此，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将会继续发生变化。当时我国非公经济在工业生产领域的比重约占70%，就业人员超过8000万人，超过国企在岗职工3000万人，非公经济出口占56.5%，进口占58%。这些方面非公经济已成为主力军而不是生力军。

二是不能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对待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

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公有制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两股道上运行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例如，按不同所有制经济来立法，制定政策，实施管理，对财产的保护也是这样。

现在，要使两股道变成一股道，两个绳拧成一个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使之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是通过实行股份制发展混合经济。有的可通过上市变成社会公众公司，实行资本社会化。二是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财产组织形式，使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关于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在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中，国有经济发挥调控力似乎比控制力更好一些。

我在2003年4月23日和6月9日文件起草小组会议上的两次发言，是经过认真思考的，是有文件记录可查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例如，提出改革是无止境、完善也是无止境的观点，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论证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已形成共识。十八大报告就不再提到2020年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又如，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内涵，十四届三中全会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述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我从五个方面提出这种表述不够科学。十六届三中全会采纳了我的建议，提出“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这种理论的创新和突破势在必行。

除了上述三次三中全会作出决定之外，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论述，都有许多理论上的创新。譬如，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而且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我没有参加十三大文件起草，但是有一个建议，登在1987年8月20日国家体改委的一个简报上，题目是《希望十三大在理论上要有重大突破》。我讲了三条意见：第一，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是一种手段和方法，不是社会制度的属性，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二，用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第三，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形式发生变化，从指令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当时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在简报上批了“送总理参阅”几个字。总理看了以后于1987年8月30日批示：“要把指令性计划改为经济合同制的观点反映到报告中去。”用经济合同制逐步取代指令性计划，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现在看来不觉得有什么，但当时却是一件大事。我在1986年带了一个18人的代表团考察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为什么带那么多人去考察呢？因为匈牙利是第一个搞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派人去考察，地方派人，企业派人，到处派人，匈牙利这个小国有点应接不暇了。他们说：我们的牛都认识你们中国人了。大家都重复地去考察，问的问题也差不多，考察的资料由各单位分别封锁起来，别人不能分享。我当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做深入的考察，要弄清匈牙利到底进行了哪些改革，哪些改革成功了，哪些改革不成功，有什么经验教训，而且把考察过程中的重要问题通过使馆用密电发回来，分发中央各有关领导。后来把考察的结果汇编成册，书名叫《艰难的探索》，资料大家共享，避免低水平重复考察。在考察中我问了匈牙利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你们为什么要取消指